

试析美国核威慑战略 演变的特点

● 吴苑思

回顾过去五十多年美国核威慑战略演变的历程，人们经常为它的纷繁复杂和变化多端而困惑。本文试图从核威慑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象、手段和效果出发，对美国核战略的变化做一些概括。在这一过程中，当前美国政府的核战略实际上成为暗含的参照系。

一、对 象

法国著名学者雷蒙·阿隆指出，一般意义或抽象意义上的

· 本论文为教育部文科科研基地重大项目“中美核威慑关系”的中期研究成果。

威慑并不存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谁在什么情况下要阻止谁做什么。^① 这是在说，威慑需要有针对性。因此，如何确定行动的对象对于威慑最终能否成功至关重要，这也是总结美国核威慑战略演变的第一个切入点。就威慑所针对的对象来看，美国核威慑战略表现出以下特点：

确定→不确定

很明显，几乎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核威慑战略所针对的对象都是明确的，那就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与战时盟国——苏联的关系就因失去共同的敌人而急剧恶化。从对东、中欧的争夺到伊朗问题，从欧洲重建到分享原子弹技术，美苏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摩擦。1946年2月，时任美国驻苏代办的乔治·凯南发出著名的8000字电报。他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是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采取敌视态度的根本原因，对付苏联已是美国外交空前的巨大任务，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② 凯南的这份报告在美国高级官员中广泛传阅，深受高层的赞许，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决策者对美苏关系和国际局势的看法。此后不久，丘吉尔就在富尔顿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杜鲁门也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至此，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全面展开，苏联成为美国对外决策中的首要关注对象。更极端地说，

① Raymond Ar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 (translated by J. E. Gabriel), in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ed.): *Problem of Modern Strateg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0), pp.29 - 30.

② 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 - 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2), pp.547 - 559.

在冷战初期世界严格分为两大阵营的情况下，美国认为在每一个针对西方阵营的行动的背后都有苏联的影子。美国的一位助理国务卿曾说，俄国同北朝鲜的关系就“同沃尔特·迪斯尼和唐老鸭的关系一样”。^① 所以，朝鲜战事一开，“没有一个人不怀疑是俄国人策划了这场进攻，利用它的北朝鲜傀儡试探美国遏制盾牌上的弱点”。^② 这就是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对威胁来源的典型看法，即使在被称为美苏“缓和”的年代也不例外。

冷战以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而结束，这就一下子使美国的总体安全战略失去了目标。“谁是我们的敌人？”成了美国安全战略制定中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各路精英费足了脑筋。从安东尼·莱克的“逆流国家”^③到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的“无赖国家”，^④再到乔治·格斯特尔的“反叛国家”，^⑤美国不断地思索着谁最“像”敌人。然而，威胁的形成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意图”，另一个就是“能力”。冷战时的苏联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全球利益的争夺上都被认为具有挑战美

① 转引自《纽约时报》，1950年6月26日。

② 托马斯·G. 帕特森、J. 加里·克利福德和肯尼思·J. 哈根著，李庆余译，《美国外交政策》（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50页。

③ Backlash States，参见：Anthony Lake，“Confronting Backlash States”，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1994，pp.45-55.

④ Rogue States，参见：Michael Mandelbaum，“Lessons of the Next Nuclear Wa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1995，pp.22-37.

⑤ Renegade States，参见：George H. Quester and Victor A. Utgoff，“No-First Use and Nonproliferation: Redefining Extended Deterrence”，Washington Quarterly，Vol.17，No.2，Spring 1994，pp.103-114.

国的意图，而从能力上来看，苏联及其盟友的军事力量也足以抗衡美国及其盟国。所以，在冷战时期要确定苏联这个威胁源并不十分困难。然而，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从能力上看，连美国都承认至少在 15 年内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①。就意图而言，如果要在意识形态上挑战美国，就必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以外的国家，这就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是，如果真有什么文明的冲突，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几乎要与全世界为敌。西方文明不管发展得多么先进，它毕竟只是世界五大文明的一种而已。^②另一方面，如果从是否有国家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这个角度来判断，那么这种国家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本来就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态。但是，如果要找像美苏冷战期间争夺势力范围的那种冲突，那么几乎又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因为在当今世界上，称得上具有全球利益的，除了美国可能只有欧盟。而美国人怎么也不会相信，欧盟会是美国的敌人。因此，布什政府只能将对安全环境的判断从“基于威胁模式”转向“基于能力判断”，从能力上去寻找它“潜在”的对手。

① 美国《四年防务评估》称，从目前到 2025 年美国可以赢得一个战略间歇期，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中，还没有国家有能力挑战美国。因此，美国要抓住这个阶段保持其领先地位。

② 有关中国学者对“文明的冲突”的评论，参见：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对称→非对称

从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经验来看，对于苏联能够“威胁”美国的手段，美国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对称，或者说相适合的威慑手段来对付。因为从根本上来看，这两个国家的能力层次相当，所要寻求的目标相近。它们之间从某种意义上形成了所谓“兄弟敌人”的关系^①，在思维逻辑和冲突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确定性。然而，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所面对的大多数国家与它的能力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这些国家所要追求的目标，它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并由此引发的对利益的看法，对美国来说都有许多出人意料的地方。因此，对于美国来说，这些国家挑战美国利益的方式不仅不确定，而且必须摆脱现有的（或者说大国之间打交道时形成的）行为方式。因为在美国看来，鉴于这些国家在一般军事能力上与美国相去太远，挑战美国不可能取得成功，它们必须找到美国尚不拥有的能力，或者在美国无法使用现在的能力的情况下，争取对美国的战略胜利。^②这样，这些美国利益的“挑战者”必然采取在美国看来与其要达成的战略目标看上去“不适合的”手段，或者说如果美国使用其维护战略

① Albert Legault & George Lindsey, The Dynamics of the Nuclear Balanc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45.

② 有关美国对于“非对称性”的界定，参见：Kenneth F. McKenzie, Jr. “The Rise of Asymmetric Threats: Priorities for Defense Planning”, QDR 2001: Strategy-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s Security, pp. 75 - 107; <http://www.ndu.edu/inss/press/QDR-2001/sdcasch02.html>.

目标的手段来对付这些挑战，在国际社会看来将是“不适合的”。

那么，这些在战略能力上与美国不处于同一层次的行为体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达到打击美国、甚至是毁灭美国的战略目标呢？美国 1997 年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美国面临的直接严重危险是非对称性威胁，这种威胁的来源往往是恐怖主义组织或个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电子黑客等非国家行为角色，他们有时也可能受到某一‘无赖国家’的指使和支持；威胁的表现形式不是战争，而是以所需费用不高、容易获取、操作不难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直接在美国的大城市中心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①可见，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威慑现在要对付的是在美国眼里不那么战略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是恐怖主义袭击，是电子战，甚至是金融战。用战略核武器，特别是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对付这些挑战就像是用猎枪对付蚊子，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战略威慑手段与所要威慑的对象之间在类别层次上的错位是美国核威慑战略变化过程中透露出来的又一个特点。

国家→非国家

与前面两个变化密切相关的是，军事安全领域也无法摆脱整个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变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这绝对不是一个新近才产生的现象。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国际关系研究刚刚在美国蓬勃

^① 宋以敏：“美国安全战略和对外关系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国际问题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37-38 页。

开展时，人们就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国际行为体——跨国公司。^① 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问题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并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这里想要指出的只是，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在最近已经以令人刻骨铭心的方式显示出来了，以至于这一国际关系行为角色在当前乃至未来的战略、安全考虑中都将不得不占有重要的位置。

然而，要说国际社会对于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安全可能造成的危害直至最近以前都毫无认识并不公正，因为非国家行为体不断在用行动提醒国际社会注意它的存在。远一点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恐怖主义性质的暗杀活动发生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激进组织的暴力活动在世界许多地方都造成过流血事件；而就近一点来看，1995年日本东京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审判工作尚未结束，而美国也是直到前不久才对麦克维制造的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实施惩罚。所有这些事件在其爆发时都不可谓不震动世界，但是，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变种引起新的震惊，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事件是它们达到的又一个高峰。因此，人们对于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并非没有认识。事实上，很多人在相当早以前就开始了对于恐怖主义等问题的研究。美国能在1997年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对

^① 关于国际关系中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参见：梁守德、洪银娴著：《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等。

可能受到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做出如此有预见性的判断，^①绝不是一时间的凭空想象就可以达到的。

因此，让美国甚至全世界都感到头痛的不是不知道这一威胁形式的变化，而是知道了这种变化以后几乎找不出有效的应对手段，因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用国际关系中的主流形式——国家去对付非主流形式——恐怖主义组织、个人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在国际关系的主流形式内解决所面临的冲突。作为国家应对矛盾的一种手段，威慑要想应对所针对对象的这种变化也必须对自身做出调节。

所以，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发现，它所要威慑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为此不断调整它所采用的这种威慑手段。反过来说，分析美国所要威慑的对象的变化，也就为我们了解美国威慑战略的变化提供了指引。

二、手 段

鉴于威慑对象的变化，美国显然要采取不同的威慑手段以便针对这些威慑对象的心理使威慑起到最好的效果。因此，在

^① “美国面临的直接严重危险是非对称性威胁，这种威胁的来源往往是恐怖主义组织或个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电子黑客等非国家行为角色，他们有时也可能受到某一‘无赖国家’的指使和支持；威胁的表现形式不是战争，而是以所需费用不高、容易获取、操作不难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直接在美国的大城市中心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见宋以敏：“美国安全战略和对外关系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1期，第37-38页。

研究美国核威慑战略的变化过程中，威慑手段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特点：

报复与实战结合

在美国的核威慑理论中有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报复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与“拒止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①所谓“报复威慑”是指以实施报复性军事打击惩罚对方来慑止敌方采取军事行动；而“拒止威慑”则是使用武力直接抵抗对方对己方的进攻和侵犯，以达到慑止对方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目的。从理论上讲，这两种形式的威慑并不是截然分裂的。美国的核威慑战略在其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在这两种威慑形式间摇摆的特点。^②这一特点在冷战后美国的核威慑战略中又一次表现出来。

乔治·W·布什政府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指出：“为了满足21世纪国家的国防目标，新的三位一体的第一组成部分，即进攻性打击力量，将超越冷战时的由洲际弹道导弹

^① 关于“报复威慑”和“拒止威慑”概念的讨论，参可见：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14 - 16; 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87), pp.135 - 138; Philip Bobbitt, Democracy and Deterrenc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Nuclear Strateg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8), pp.7 - 8; 姚云竹著：《战后美国威慑理论与政策》，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 - 12页。

^② 有关美国核威慑战略在报复威慑与拒止威慑之间摇摆的讨论，参见：吴苑思著：《威慑理论与导弹防御》，长征出版社，2001年11月；以及吴苑思：“非理性武器的理性使命：论核威慑理论的困境”，复旦大学博士论文，完成于2002年5月。

(ICBM)、潜射弹道导弹 (SLBM) 和远程轰炸机组成的三位一体。当然，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远程轰炸机和核武器将继续起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们将仅仅是新的三位一体的第一个组成部分的一部分，它们与新的增强我们进攻威慑力量可信性的非核战略能力一起构成一个整体。”

这里可以看到，战略核武器的重要性在小布什政府那里虽然已经大为降低，但是仍然不愿意被放弃，因为具有生存能力的战略报复力量毕竟仍然是阻止对美国本土发动战略核打击的最具威慑力的手段。正是基于对战略报复力量的这种认识，小布什政府在提出它的博取国际政治声望^①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计划时增加了许多前提条件。在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克罗什宣布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保留：1. 所削减的是可操作的部署中的战略武器弹头；2. 到2007 财政年度部署的战略武器削减到 3800 枚弹头时，美国将评估如何进行以后的削减；3. 计划中的削减是以“阶段性重新评估”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一旦需要，美国行政当局可以立即停止削减、甚至重新提高部署中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数量。由此可见，美国仍然不愿意放弃报复力量在威慑中的角色。

^① 对于小布什提出的削减战略核武器计划，美国的裁军支持者都不得不给予肯定。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前民主党参议员、新学院大学校长罗伯特·克里和新学院大学世界政策研究所军火贸易资源问题中心主任威廉·哈通在一篇文章中就谈到：“……他的讲话中最有远见的部分却是，他赞成削减美国的核武器储备，把核武器的储量减少到‘符合我们国家安全的尽可能最低的数目……’”参见：“布什政府面临的挑战：采取一个新的核态势”，Arms Control Today, April 2001.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实际战争中能够加以使用的武器对于威慑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美国政府的强调。在小布什政府看来，“那种只依赖进攻性核力量的战略态势不适于我们将在 21 世纪面对的潜在对手”，因为美国对于威慑的最终认识是“美国的战略力量需要为总统提供一系列的选择以便打败任何侵略者。”^① 这样，面对新的安全环境，美国所争论的不再是“报复”还是“拒止”能更好地实施威慑，而是它们怎样结合才能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为了达到“全频谱”的威慑效果，报复和实战能力被认为都必须加以利用。

进攻与防御结合

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以前，进攻与防御似乎是一块金币的两面，根本就无法进行分割。在任何一种“新式”武器发明后不久，人们总能找出克服它的办法，并由此引发研制和生产更新式武器的热情。但是，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这一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人们始终没能对具有大规模毁灭能力的核武器建立起有效的防御，核时代似乎更加青睐进攻武器。

然而，如果对核时代进攻与防御分裂的现象进行分析，我们恐怕不得不说，其根本原因在于核武器的爆炸威力过于强大。在核武器的这种毁灭威力之下，防御系统如果不能做到百分之百有效，那与根本没有防御并无多大区别。因为只要哪怕有一枚核武器漏网，对人类造成的损害可能就无法估量。这样，防御所需要的成本与它可能实现的价值之间根本不成比例。核时代表现出更加有利于进攻力量的趋势。

核时代的进攻与防御在理论上的这种分裂很快对实践产生

① 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前言）——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了影响。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终究是有限的，在进攻与防御互相割裂、并且不能同时以相同力度追求的情况下，如何分配资源、更好地安排武装力量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就成为决策者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这场资源争夺战不仅仅单纯涉及到两个概念的选择，而且更牵涉了不同部门与集团的利益争夺，因为不同部门、不同集团在设计、开发、制造和使用这些武装力量中的作用与可以获得的收益是不同的。这样，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武器系统的使用就与国内政治斗争牵扯在一起，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变得更加复杂。^①

但是，进攻与防御在核时代的分裂主要还是由于受到技术的限制，因此一旦科学技术上出现某些进展，发展导弹防御的呼声就会高涨，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政府推出战略防御倡议的过程中表现得相当明显。^② 冷战结束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比较宽松的国际安全环境再一次为美国提供了加快发展防御力量的合适土壤。小布什政府力图抓住这样一个机遇，他说：“我们需要新的同时建立在进攻和防御力量之上的

① 有关核威慑战略选择过程中的政治斗争，参见：Lawrence Free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钮先钟：《现代战略思潮》，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 年；Edward Reiss, *The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8.

② 一位写过三本有关里根总统的书的人士回忆说，里根曾告诉他，在 1983 年 2 月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成员认为，“今日的技术”使防御性核盾牌成为可能。此次会议后，里根总统便大步向“星球大战”计划迈进。参见：Lou Cannon, “Reagan's Big Idea”, *National Review* (February 22, 1999), pp. 40-42.

威慑概念。”^①通过将已经拥有的核进攻优势与本土防御结合起来，美国希望构成更加全面与平衡的威慑能力，从而更好地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

美国人的这一如意算盘固然打得不错，但目前的技术条件毕竟仍然只能使导弹防御得到一个很低的拦截成功率。^②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导弹防御是否有利于维护国际局势的稳定十分值得认真加以探讨。^③盲目地追求导弹防御可能最终阻碍国际核裁军的进一步发展，刺激新的军备竞赛，从而使国际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最终也将使导弹防御系统拥有国的安全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核与“常规”结合

除了寄希望于防御系统，实战特点更加浓厚的拒止威慑还经常强调常规力量的发展，因为这些武器在核时代被用于实战所引起的争议最小。在这一点上，小布什政府也不例外。《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将改进的常规力量与核进攻力量一起并列为

^① “President Bush’s Speech on Nuclear Strategy”, Arms Control Today, June 2001.

^② 关于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有效性的分析，美国导弹防御试验的分析，以及对导弹防御反措施的分析，可以参见：Lisbeth Gronlund and David Wright, “The World Missile”, *The Last 15 Minutes – Ballistics Missile Defense in Perspective* (Coalition to Reduced Nuclear Dangers, 1996); “Countermeasures: Excerpts from a Report by 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and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ecurity Studies Program”, Arms Control Today (April 2000), pp.33–36.

^③ 关于威慑与稳定的关系，参见：Albert Legault & George Lindsey, *The Dynamics of the Nuclear Balanc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Chapter 3 & 4.

新的三位一体之一。

应该看到，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战略界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大加口诛笔伐时提出的“有限战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的结合提供了机会。因为将战争的目标和后果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有限战争，必然需要能够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而常规武器显然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关“有限战争”理论的讨论并未实质性地提高常规武器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这可能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1）相对于苏联和华约集团，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常规武器方面从来不占有优势；（2）大规模发展这种常规军事力量在西方阵营内部受到比较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① 所以，在冷战中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常规武器看上去只是战略武器的附庸。^② 美国的常规武器系统之所以在冷战后得到迅速发展，是因为受到了国际格局急剧变化的重要影响。^③

然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这里口口声声所说的“常规武器”概念早已不是人们心目中的机枪、火炮了，也许冠之以“高科技”武器更加适当一些。这些以生存性好、机动力强、打击精度高为特点的当代常规武器，在海湾战争、科索

^① 艾森豪威尔政府强调战略威慑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核武器相较于常规武器更加经济。参见：Lawrence Free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② 姚云竹著：《战后美国威慑理论与政策》，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72 页。

^③ 姚云竹著：《战后美国威慑理论与政策》，国际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67-168 页。

沃战争，乃至最近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以至于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说：“新常规军事力量为美国增添了一整套慑止战争的有效能力。尽管它比不上核武器的威力，但用作威慑力量却更加可信，特别是在美国有关键利益的地区冲突中。对付涉及机械化部队作战，而不是游击战的地区冲突，新常规军事力量有潜在的重要威慑作用。随着现代武器在世界上政治动荡地区的扩散，这种战争发生的频率将越来越高。新军事能力还可以成为阻止地区强国使用化学武器的威慑力量，使在欧洲和朝鲜阻止大战发生的业已十分有效的威慑机制得到进一步加强。美国现在可以有这样的自信：在这些地区，只要使用常规军事力量就能够击败常规机械化进攻，从而把核武器的作用仅限于慑止核进攻。”^①这段话可以说为美国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在冷战后的结合做了最好的注释。

三、效 果

如何评价威慑的效果实际上是威慑理论界根本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正像亚历山大·L. 乔治和理查德·施莫克所说，对于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都很难证明某一因素是否是它发生的根源，更何况威慑所要做的是让一种结果根本就不发生。因此，这里仅通过三个典型的案例从侧面观察一下美国的威慑努力在国际上取得了何种效果。

^① William Perry, “Desert Storm and Deterrence”, *Foreign Affairs*, Autumn 1991, pp. 61 - 82.

印度

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在进行了大量准备之后,印度在拉贾斯坦邦博克兰沙漠地区分别进行了3次和2次核试验。根据当年5月17日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奇丹巴拉姆和国防部长科技顾问阿卜杜勒·卡拉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说法^①,这5次核试验中包括1枚4.5吨级的氢弹;1个1.5万吨级的裂变装置;3个分别为200、500和300吨级的低当量装置。^②两个多星期之后,印度的夙敌巴基斯坦也在两天内分别进行了5次和1次核试验,其总数正好等于印度1998年核试验与1974年“和平核爆炸”的总和。至此,印度和巴基斯坦总算向世人证明了它们的核能力,虽然它们的核能力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早就是个公开的秘密。

印度的核试验在全世界引来一片指责。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尽管印度不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字国,但它进行核试验违背了国际社会已经达成的有关协议精神。^③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等纷纷宣布对印度实施制裁。中国在5月12日对印度核试验表示严重关切之后,又于5月13日强烈谴责印度的行为。6月4日,在中国和美国的提议下,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在日内瓦召开外长会议。会议发

① 白景山：“印度披露核试验部分细节”，《文汇报》，1998年5月19日，第3版。

② 国际社会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所宣布的核试验数字以及核试验规模是否准确有所怀疑。参见近藤丰和：“专家怀疑印巴对各自核试验的规模和次数均有所‘夸大’”，《产经新闻》，1998年6月4日。

③ “国际社会对印核试验反应强烈”，《人民日报》，1998年5月13日，第6版。

表的联合公报谴责印巴的核试验，要求两国尽快制止由于核试验引起的紧张局面。公报强调，五国不承认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国家地位，并要求两国政府立即停止核试验，放弃发展核武器和进行核部署，无条件地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核不扩散条约》。^①可见，印度的核试验遭到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对。

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冷战后将不扩散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列为首要国家安全目标的美国，为什么不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前制止它呢？也许这种说法对于美国并不公平，1995年就是因为美国发现了印度的核试验准备工作而使印度的核试验计划流产。印度吸取了1995年的教训在1998年不仅更加小心，而且采取了多种手段躲避国际社会的监视。^②印度的这些苦心显然没有白费，也算对美国报了1995年的一箭之仇，使常常以国家技术手段^③自夸、以不扩散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为首要国家利益的美国在全世界面前大丢颜面。

因此，印度的例子告诉我们，不扩散大规模毁伤性武器虽

① 蔡佳禾：“五大国外长会议公报与制止南亚地区核军备竞赛”，《国际展望》，1998年12月，第8-11页。

② 秦世森、陈健、刘传明：“印度核试验中的反情报站”，《国际展望》，1998年第12期，第28-29页。

③ “国家技术手段”是指，国家拥有的用于军控与裁军条约核查的侦察技术手段，其中包括间谍手段，有许多是保密的。公开的国家技术手段系指遥感探测手段，即成像侦察卫星、电子侦察卫星、核爆炸侦察卫星、海洋监测卫星、机载雷达和光学系统，以及海基和陆基雷达、水声、次声、地震波侦收设备等。参见：刘华秋主编：《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472-473页。

然有利于国际安全,^①但即使是像美国这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庞大的强制力量的国家单靠一己之力也无法完成这一使命。让人更加泄气的是,在印度核试验后不久,美国总统克林顿仍然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几十年来对印度的首度访问难道就是为了促使印度放弃核武器吗?受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后,美国借口打击阿富汗塔利班之需终于全面解除了对印度的制裁。这样,美国再一次用它的行动表明,对于印度这样有自主开发能力的大国,只要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仍被赋予价值,美国就不可能用威慑或诸如此类的政策迫使它们最终放弃这一选择。

伊拉克

“伊拉克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有油水’的富国。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条大河穿过肥沃的两河流域,地底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油田……”有人曾这么写道。^②确实,伊拉克是中东地区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它不仅具有悠久的古代文明,而且是当代重要的产油国。在两伊战争结束至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平均日产原油350万桶。^③然而,伊拉克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如此,而且它还是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与邻国——伊朗一

① 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看法。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思·华尔兹的一个著名观点就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多越有利于维护国际稳定。

② 唐师曾著:《重返巴格达》,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③ 1998年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1125亿桶,在世界上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参见: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对伊拉克的介绍。<http://www.fmprc.gov.cn/chn/6616.html>。

战就是八年，被认为是在中东地区牵制伊朗的主要力量。因此，在中东的棋盘上伊拉克是一枚不小的棋子。可是，让美国感到头疼的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地区强国却控制在由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手中。对于这个以实现阿拉伯统一为己任的政党，美国一直保持着警惕。在冷战时期，由于要对付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美国不得不暂且容忍热衷于阿拉伯复兴的萨达姆、卡扎菲等人。然而，一旦苏联和东欧的问题得到解决，美国就立刻腾出手来对付在海湾石油产区的这些心腹之患。于是，海湾战争爆发了。

虽然海湾战争早在 10 年以前就结束了，但是伊拉克到现在也没能恢复到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不能不说与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有关。自海湾战争结束以来，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核查问题一直在美国与伊拉克关系中处于显著位置。两个国家甚至因武器核查问题多次走到战争的边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人指出，武器核查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美国向伊拉克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是美国“塑造”伊拉克的手段之一。^① 美国通过武器核查、在伊拉克边境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威慑手段，归根结底都是要谋求美国在海湾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产区的利益。而对于美国来说，最有利的情况莫过于使萨达姆下台，换上一个对美国俯首帖耳的人，同时保持伊拉克的一定实力。^② 所以，伊拉克向我们说明了美国威慑战略对于塑

① 鲁人：“析美‘塑造、反应、准备’战略在伊武器核查上的应用”，《外国军事学术》，1998 年第 6 期，第 21—23 页。

② “核查危机：美伊如何动作”，《了望新闻周刊》，1998 年第 8 期，第 4—7 页。

造地区局势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经历了一场与美国的战争和 10 多年的联合国经济制裁之后，伊拉克现在的经济状况可想而知。但是，同样使美国人感到尴尬的是，萨达姆还在台上，而且在伊拉克查了十年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之后，人们可能还是没有十分的把握说，伊拉克已经没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了。这就是美国对伊拉克威慑的结果吗？

本·拉登

虽然人们现在几乎已将本·拉登作为恐怖主义的同义词来使用，但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并没有向全世界显示证据确认到底是谁策划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① 只是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基地组织的不断打击，使人们猜想大概就是他们需要为“9·11”事件负责。

当然，袭击纽约世界贸易大厦这件事本身非常令人气愤，因为它造成了那么多无辜平民的伤亡及其家属的悲痛，这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和破坏，理应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也正是因为这样，国际社会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② 2001 年 10 月 7 日，美国正式开始对阿富汗实施军事行动。当年年底，塔利班政权就被赶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国的军事行动取得初步成果。美国几个月内在阿富汗取

① 美国只是向其盟友——英国等介绍了它所掌握的关于本·拉登策划了“9·11”事件的证据。

② 虽然不少国家不认为采取军事行动可以对付这样一个挑战，但它们在正式场合基本上都未公开反对美国。这一点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得的军事进展确实让很多人感到吃惊，因为阿富汗毕竟曾让前苏联那个庞大的军事机器深陷其中达 10 年之久，而美国此次军事行动无论是在人员伤亡、物质损耗，还是在政治影响等方面付出的代价都极其有限。美国更是利用它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调整了与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一些中亚国家的关系，为将来扩大它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做好了铺垫。

但是，美国在阿富汗行动中取得的这些成果并不足以评估其威慑恐怖主义可能取得的效果。即使从阿富汗行动本身来看，如果以美国发动这次军事行动的根本合法性——反对恐怖主义来看，就很难说这场斗争是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固然塔利班被赶下了台，固然本·拉登等人被逼得四处逃散，固然美国声称捕获了不少塔利班的高级官员和本·拉登的高级助手，但是，奥马尔在哪里？本·拉登在何处？只要一天不能证明这些被认为是纽约世界贸易大厦袭击事件的主谋及其庇护者已经被捕获或被击毙，这场以打击恐怖主义及其庇护者为旗号的军事行动就不能被认为取得了成功。然而，即使美国抓住了本·拉登等人又将如何？将他们绳之以法，处以极刑？即使让本·拉登等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的死是否真的能制止恐怖主义事件在今后的发生，这实在非常让人怀疑。正如许多中国学者已经指出的，恐怖主义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的不公正，这不是仅依靠军事力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美国打击本·拉登恐怖主义组织这一行动提醒人们，用威慑或者说用军事力量对付恐怖主义的效果将非常有限。为此，有人再次强调“威慑 + 不扩散 + 防御”的重要性，这一办法是否会更加有效仍然需要时间做出证明。

总的来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核威慑战略发

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冷战结束以来，核威慑虽然仍然被认为是美国整体战略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其重要性呈现下降趋势。美国在实施威慑的过程中强调了实战的作用，这种转变具体来说是对其所要针对对象的变化做出的反应，并具体体现在威慑手段的重要变化上。但是，美国的核威慑在经历了这些变化后到底能在实践中起到何种效果仍然值得讨论。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成帅华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朱明权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任 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华 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庄建中 上海环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孙 哲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张纪康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吴莼思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